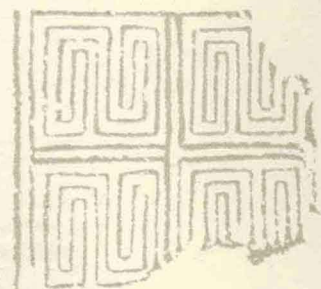


山东地方史文库（第二辑）

韩寓群 主编

山东思想文化史

孟祥才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思想文化史 / 孟祥才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10

(山东地方史文库. 第二辑)

ISBN 978-7-209-05808-7

I. ①山… II. ①孟… III. ①思想史—山东省 ②文化史—山东省 IV. ①B2 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4322 号

责任编辑:李明功

封面设计:蔡立国

山东思想文化史

孟祥才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27.75

字 数 420 千字 插 页 10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808-7

定 价 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山东地方史文库》总序

《山东地方史文库》历经三年多努力,终于正式付梓,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根据考古发现,距今四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今山东沂源一带劳动、生息、繁衍,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大约在四五千年前的虞舜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后期,山东地区即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在这里曾产生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中最著名的有: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思想家墨子、孟子、庄子、荀子,政治家管仲、晏婴、诸葛亮、房玄龄、刘晏,军事家孙武、吴起、孙臬、戚继光,科学家和发明家扁鹊、鲁班、汜胜之、贾思勰、燕肃、王祯,文学家和艺术家王羲之、刘勰、颜真卿、李清照、辛弃疾、蒲松龄、孔尚任,以及中国共产党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等,其余多如璀璨明星,不可胜数。这些先贤们的思想和业绩都已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仍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山东的历史,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是一部灿烂辉煌的历史。山东人民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值得后人去发掘、探讨、借鉴和发扬光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省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在山东地方史的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编写出版了包括《山东通史》在内的一批研究地方史的著

作,为后人探讨和研究山东历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新编《山东地方史文库》,包括新增订的《山东通史》和初步计划编写的10部《山东专史》。《山东通史》从纵的方面记述山东自远古至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包括山东社会形态的变化、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典章制度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山东专史》则是从横的方面研究山东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社会风俗、中外交往等方方面面的历史。采取这样纵横交错、互为补充的研究方法,可以让人们更加全面和系统地了解 and 认识山东历史,更能领悟到我们的先人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思想、灿烂辉煌的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也可以从中总结和吸取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而丰富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邓小平同志也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他还有一句名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研究和学习山东的历史,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认识山东的昨天,更好地把握今天,从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一个优良传统。多年来,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带领山东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发前进,无论是在发展经济还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进入了山东历史上发展最好、较快的又一个历史时期。《山东地方史文库》的编写出版,不仅继承和弘扬了山东悠久而丰厚的历史文化,而且有助于我们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编写《山东地方史文库》的动议酝酿于2006年3月,当时担任省长的我意识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想法得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以及省内从事山东地方史研究的专家教授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尤其是安作璋教授,不顾年事已高,担任《文库》学术顾问,尽心竭力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领导工作,山东师范大学的领导同志以及山东地方史研究所为此《文库》的编纂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主编,我感谢来自省内有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各位主编、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编写出版这一套高质量、高品位的《山东

地方史文库》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省党史委、史志办等有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文库》的编写出版,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同志们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今后编写好出版好《文库》中的其他各类专史继续努力。

是为序。

韩寓群

2009年7月

序

山东自古号称“齐鲁文明礼仪之邦”，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这块雄踞陆海、美丽而富饶的祖国大地上，曾培育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智慧，与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大量造福于人类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而构成了山东历史丰厚而富有特色的内容，谱写了山东历史绚丽多彩的篇章。

本次编写出版的《山东专史》系列，为《山东地方史文库》的第二辑，包括《山东政治史》、《山东经济史》、《山东军事史》、《山东思想文化史》、《山东科学技术史》、《山东教育史》、《山东文学史》、《山东社会风俗史》、《山东移民史》、《山东对外交往史》等10部著作，较全面地研究和反映了山东古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科技、教育、文学、风俗、移民、外交等领域发展、变化的历程。《山东专史》系列和已出版的《山东通史》一样，在编写思路 and 结构上都采取纵横相结合的方法，不同的是，《山东通史》以纵带横，纵中有横；《山东专史》系列则是以横带纵，横中有纵。如果说《山东通史》是从纵的方面系统地探讨山东历史各个领域的发展演变，《山东专史》系列则是从横的方面对山东历史不同领域进行重点的研究，也可以说《山东专史》系列是对《山东通史》中一些重要领域的细化和补充，这两部著作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比较系统全面地体现了《山东地方史文库》丰

富的内容及厚重的文化积淀。

《山东专史》系列各卷的作者,均是山东省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多年从事有关领域研究的教授、研究员等专家学者,他们在山东历史的研究方面均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资料积累和写作经验,因此对其撰写的书稿都能做到比较深入的研究。每卷作者在撰稿中都注意吸取当今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对有争议的问题则采取了比较客观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10部专史大都具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思路清晰、系统条理、文字流畅、深入浅出等优点;另附有与文中内容相关的多种图表,以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

近年来,山东学者对于山东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先后推出了《山东通史》、《齐鲁文化通史》、《济南通史》、《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山东革命文化丛书》、《山东当代文化丛书》、《齐鲁诸子名家志》、《山左名贤遗书》、《齐鲁文化经典文库》、《山东文献集成》等多部大型系列著作(省直各部门、各地市县的研究成果尚未包括在内),表明了山东地方史的研究已走在全国各省地方史研究的前列,对于研究山东、宣传山东、存史资政育人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次《山东地方史文库》中10部《山东专史》的出版,对山东地方史研究来说,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看,都有新的开拓,也是山东省文化建设工程的又一项重大成果。对于当前和今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山东,推进山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衷心希望参加编写的作者和出版社的同志们,在老省长、《山东地方史文库》总主编韩寓群同志的领导和山东师范大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善始善终地继续做好《山东专史》系列第三辑、第四辑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并预祝这项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圆满成功。

安作璋

2011年5月

前 言

在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发展格局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地域文化。如从三代到战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甘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等。在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为文化的因子融入了主流文化。从秦汉开始,山东地区的思想文化就是作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存在和发展,同时又具有同其他地方不同的地域特点,在各个历史时期为主流思想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

齐鲁文化发轫于东夷文化。这个文化的创造者首先是 50 万年前从原始森林中勇敢地走出来的沂源人。从原始社会至夏商时期,齐鲁的东夷人逐渐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泰山以北,以今之淄博为中心,是爽鸠氏、蒲姑氏等活动的地域。泰山以南,以今之曲阜为中心,是少昊、蚩尤、颛顼、后羿、奄等部落和方国的居地。与之相对应的考古文化是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东夷人中产生了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巫觋、巫史、祭司、医生、天文学家和艺术家。大汶口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了占卜用的龟甲。相传颛顼氏任命的“绝地天通”的重黎就属于巫史之类。少昊部落中担任“历正”的凤鸟氏与尧时代的羲、和等,显然是一批天文学家,他们能够观象授时,并且知道四季的划分。与此同时,作为记录工具的文字也发明出来,大汶口和凌阳河出土的陶文应是中国较早

的象形文字,还可能是甲骨文与金文的先驱。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东夷文化是当时中国境内较先进的文化之一。但是,夏朝建立以后,东夷文化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支撑而逐步丧失了其优越地位。在强大的夏文化冲击下,东夷文化开始变异,其表现是对夏文化的吸收和向夏文化的靠拢,其对应的文化遗存是岳石文化。商朝建立后,东夷文化则进一步向它靠拢和融合。商人本是东夷人的一支,在文化上二者是同源的。在夏商时期的千年历程中,东夷文化虽然不够张扬和辉煌,但由于它对夏商文化的广泛吸收,大大增强了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形成了蒲姑与商奄两大文明中心。西周以后,正是从这里生发出光耀千古的齐鲁文化。

西周初年,通过大分封在今山东地区建立了齐、鲁两大诸侯国,标志着齐鲁文化区域的初步建立。西周时期的齐鲁文化是一种以周文化为主导,融合了夏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这一文化系统是由齐文化和鲁文化两个亚文化系统组成的。

齐国的建立者是周朝的异姓贵族姜尚。他所在的氏族本是东夷人的一支,因而极易与东夷人找到文化上的认同。他在齐国奉行“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尚功”的治国方针,铸就了齐文化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尚法治、扬兵学、倡开放的文化品格。春秋时期,管仲相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将齐桓公推向五霸之首的尊位。同时继续弘扬齐学的优长。他以“水本原论”展示唯物论的自然观,以“顺民心”和“上功富民”展示民本意识,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展示礼治和伦理观念。此外,他在法律、军事和外交思想方面也有许多创见,大大拓展了齐文化的领域,深化了它的内容。管仲之后百余年,齐国又出现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政论家和思想家晏婴。他崇尚节俭,深自谦抑,提倡礼制,强调德化,要求维护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以及各色人之间的等级秩序,同时要求关心百姓疾苦,减轻对他们的剥削。在哲学上他主张“和而不同”,批判神道迷信,显示了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他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齐学的内容。

在齐文化迅速发展并向四方传播之时,泰山之阳的鲁国孕育发展了颇具特色的礼乐文化。鲁国是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国,而他正是周王室“制礼作乐”的始作俑者。这样,鲁国就成为周文化在东方最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鲁国是各诸侯国中唯一可使用天子礼乐的国家。它从周王室那里

得到了“祝宗卜史”等专职文化官员和相关的礼器与文物典册,所以春秋时期吴国季札访鲁时才有“周礼尽在鲁矣”的慨叹。鲁文化极力维护周文化的纯正性,特别讲究道德名节,注重研究传统文化和阐发宗法伦理观念。正是这样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氛围,孕育了儒家学说和它的伟大创始人孔子。

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公室沦落和贵族间斗争的日趋激烈,出现了“礼崩乐坏”和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这就促成了私学的勃兴和文化成果的传播。这种形势就为孔子这样的思想文化领袖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孔子以仁学与礼学交融互补,构筑了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一面大力提倡以重礼乐、倡教化、明等级为主要内容的礼学,同时又极力弘扬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爱人”、“立人”、“达人”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道德自觉和主动求善的内动自律,推出很高的道德境界与人格理想。而他的天命观和鬼神论则充满了昂扬向上的主观能动精神。他整理的五经不仅为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立下不世之功,而且为儒家学派选定了最基本的思想资料,加上他创办私学,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弟子,这一切就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广收门徒,周游列国,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加上其后学的努力,既使儒学日益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也为战国百家争鸣思潮的勃兴起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作用。特别是鲁文化与齐文化一开始就进行频繁的交流,增强了相互之间的渗透与融汇,展示了两种具有紧密亲缘关系的亚文化之间异质互补的特征。由于孔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上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因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有了儒家学说,齐鲁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二

战国时代是齐鲁文化的发皇期。这一时期,田氏代齐,标志着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齐威王厉行改革,使齐国成为经济和军事力量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齐威王、齐宣王建立和扩大稷下学宫,礼贤下士,吸引大批列国学者前来讲学和研究,使齐国一时成为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百家争鸣中不少顶尖的学者,如孟子、荀子、宋钲、尹文、淳于髡、彭蒙、慎到、田季真、接予、环渊、邹衍、兒说、田巴等,都曾为稷下学派的繁荣作出了创造性的贡

献。与此同时,日趋衰微的鲁国也在思想文化上创造了骄人业绩,出现了墨子、子思、孟子等思想巨人。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墨家学派、儒家的思孟学派、荀子学派、黄老稷下学派、邹衍的阴阳五行学派以及接续孙武兵学的孙臆兵学,并以比春秋时期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全国播扬。

墨翟创立墨家学派。他代表“农与工肆之人”,主张“兼爱”、“尚同”、“尚贤”、“非命”、“非乐”、“节用”、“节葬”、“尊天”、“事鬼”,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的思想为汉代董仲舒构筑新儒学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料。

子思和孟子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思孟学派。子思是联系孔子和孟子的桥梁,他创立了“天道性命”、“正心诚意”以及从“正身”、“导民”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套理论。孟子宣扬“性善”,倡导“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要求“制民恒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他还鼓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荀子创立的孙氏之儒虽然与孟氏之儒隐隐对立,但对礼教与德化的认识基本一致。荀子的“天论”集先秦唯物论之大成,“礼论”集先秦礼学之大成。他以舟水喻君民关系,援法入儒,主张礼法兼容,德刑并用,大大拓展了儒学的施政空间。孟子和荀子不仅大大丰富了儒学的内容,完善了儒学的体系,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了儒学和扩大了这一学派的影响。

黄老学派是不同于老庄学派的新道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一书中。它主张“君道无为”、德刑兼用,减轻剥削,为百姓创造一个宽松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后来被汉初统治者选为统治思想。

稷下学派的邹衍创立了阴阳学派。他将商周以来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学说加以改造,将五行相生相胜的理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以五德之运诠释王朝的更替。他还创造了大小九州的概念,扩大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视野。另外,在稷下学者中,还有法、名、兵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为丰富和发展齐鲁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此时期齐、鲁两种亚文化的发展、交流、融汇、整合以比春秋时期更快的速度进行,从而为汉代齐鲁文化跃升为主流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短命的秦皇朝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政策,窒息了百

家争鸣思潮。又以“焚书坑儒”将知识分子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加速了灭亡的步伐。汉初推行黄老政治,虽然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引来诸侯王坐大和豪强肆虐横行等弊端。于是汉武帝与董仲舒相结合,将儒学推上了统治思想的宝座。

秦朝统一以后,由于百家争鸣的结束,齐鲁之学面临全新的形势,每个学术流派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在进行整合与改造。经过秦到汉初 80 余年几代儒家学者的努力,齐鲁儒学发展成为当时势力最大、最具生机的学派,展示了较其他任何学派都无法比拟的优势:

一、它拥有一批经过整理的稳定的思想资料,如五经和《论语》、《孟子》、《荀子》等。

二、它拥有一批学识渊博、声望卓著的学者,他们或做官从政,或聚徒讲学,在政界和学界大大扩展了儒学的影响。

三、经过自春秋至汉初数百年的传播,齐鲁儒学早已突破地域界限,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播扬,影响日益扩大。

四、经过数代儒家学者的不断改造创新,特别是经过一位非齐鲁的学者董仲舒的精心整合,将齐学与鲁学的优长融为一体,儒学于是以全新的面貌赢得了汉武帝的青睐。这样,通过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热烈拥抱,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将儒学推上了主流意识的殿堂。这其中,太学的建立,经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从儒生中选取官吏制度的推行,使儒学的主流意识地位日益巩固。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学作为主流意识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对稳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它既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又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中国宗法农业社会最适宜的意识形态。第一,儒学倡导大一统,鼓吹“内诸夏而外夷狄”,反映了中华民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蕴涵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第二,它倡导尊君爱民,鼓吹等级秩序,“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找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利益的结合点。第三,它提倡的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说,给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反映了君、臣、百姓对伦理道德的认同。第四,儒学具有强烈的

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和博大深广的人道主义精神,蕴涵着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既要求对百姓实行“仁政”、“德治”,肯定“汤武革命”,又提倡“仁爱”、“立人”、“达人”、“推己及人”,鼓吹以“爱心”和“亲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第五,它倡导“尽人力而听天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独立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识。第六,一贯重视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第七,儒学具有开放的学术品格,能够不断从“夷狄”等异质文化中吸纳知识与智慧,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它不是一个自满自足、僵化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与时俱进的奋发进取意识的开放性的学派,因而能够在历史的前进运动中不断增强对社会和人生需求的适应能力。第八,儒学具有实践性和普及性的品格。它没有故作高深的玄理,也不用晦涩难解的文字,其政治经济思想、伦理道德情操、人生价值理念,都是用比较贴近百姓的语言和司空见惯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能够润物细无声般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田之中,融化到人们的血液里,变成民族的文化基因。

反观先秦时期那些与儒学并峙而立的学派,尽管各有优长,但本身都存在明显的缺失。如墨家的“简而难尊”,法家的“刻薄寡恩”、“有术易以兴,无术易以亡”,道家的“无为”、“为我”、“出世”,阴阳家的“使人拘而多畏”,名家的“苛察徼绕”、“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农家的平均空想等,使它们都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对主流文化的诉求。只有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既保留了原始儒学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又有选择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基本上消除了原始儒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弊端,成为内容最丰富,涉及政治、哲学、经济、伦理、教育等涵盖深广的学说,因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组成部分,为中华帝国的长期存在、发展和几度辉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撑。尽管两千多年来,星移斗转,世事变迁,外来文化数度冲击,但由于儒学有着很强的因应能力,它的地位一直是安如磐石,没有丝毫动摇。直到近代,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西学冲击下,儒学的颓势才显现出来。这一情况表明,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和与它相适应的文化已经面临全面的变革。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三个半世纪多的岁月,在经历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南北对峙、北方多民族政权并立互易、南方皇朝频繁更替的多事之秋。随着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和北方少数民族入主黄河中下游,在思想文化上就形成了多元并存和中外文化、不同地域文化以及儒、佛、道文化持续交流、互动和融合的局面。这一时期,在文化的传承上,自东汉末年崛起的世家大族起了重大作用。孔氏、琅邪颜氏、琅邪王氏、清河崔氏、泰山羊氏等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儒学尽管受到外来的佛学和由道学转化而来的玄学的巨大挑战,但它在政治上作为统治思想、社会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并没有动摇。魏晋时期,东海郗(今山东郯城)人王肃在经学上创立的“王学”取代了“郑学”的独尊地位,对南北朝时期的经学也产生了深巨影响。南朝的山东儒生王淮之、宋昇明、吴包、伏曼容、卞华、崔灵恩、张讥、明山宾等都有经学著作问世,为经学在南朝的延续和传播作出了较大贡献。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和大量汉族士族南渡,北方经学一度呈衰颓之势。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以后,北方经学开始复苏,山东儒生王欢、房景先、崔浩和张买权等名重一时,是该时期经学的领军人物。魏晋玄学两个开山人物之一的王弼是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人,他虽然只活了24岁,却以《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上不朽的地位。王弼的同乡张湛则以《列子注》一书接续王弼在东晋时期扛起了玄学的旗帜。玄学的风流余韵延续至南朝,已经失去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们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变成了名士们炫耀智慧和辩术的清谈之学。流寓南方的山东士族的代表人物王戎和被誉为“竹林七贤”的名士群体,王衍和被誉为“四友”、“八达”的名士群体,以及王导、王敦和他们周围的那批人,就是南朝玄学家和清谈家的代表。

隋唐五代时期(618—96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二个发展高峰。“盛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成为继两汉之后的又一个发皇期,而且在当时的东亚乃至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山东的思想文化领域再一次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推出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其中,

吕才带有强烈唯物论色彩的哲学思想,房玄龄、马周带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开明的政治思想,孔颖达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刘晏“以人为本”、“养民为先”的进步的经济思想,显示了山东思想家在这一领域的实绩,奠定了他们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这一时期,士族仍然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清河崔氏、琅邪王氏和颜氏、兰陵萧氏等家族仍然是历数百年不衰的著名文化家族,他们为儒学在这一时期的复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不过,随着科举考试的实行,使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跻身于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行列,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向世家大族发起了挑战。隋唐统治者尽管对儒、佛、道采取了兼收并用的态度,但由于儒学的基本理念最符合统治的需要,又深深根植于中国百姓的潜意识中,所以必然被作为统治思想加以宣传和播扬。正因为如此,作为儒学教主的孔子就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祭孔也就成为国家级祭祀中的最隆重的大典之一。由于孟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唐代得到认可,他的地位得以大大提升,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圣贤”,被韩愈誉为儒学道统传播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孟子》一书也进入“经”的序列。这一时期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山东学者颜师古考订《五经》和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使以后的学校教育有了统一的具有权威解读的教科书。中唐时期,经学领域吹来一股疑古之风,对汉儒的拘守章句、抱残守缺的学风提出了挑战,力图对经书的义理进行新的诠释。濮州鄄城(今属山东)人王元感以《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衍》等著作成为疑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宋辽金元时期(960—1368年)的四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由北宋统一到宋与辽、金、西夏的对垒互峙,再到元的统一的历史演变。由于辽、金、西夏和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而宋代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文化也创造了新的辉煌,其重要标志就是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所昭示的儒学的复兴。在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中,泰山书院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和胡瑗起了肇始者的作用。后面两人虽然都不是山东人,但由于他们与石介和泰山书院联系在一起,他们自然也就作为泰山学派的领军人物归入齐鲁文化的创造者之列。由他们接续唐代疑经学派对汉儒繁琐章句训诂之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从而逐渐形成了宋儒“议论解经”和“疑经改经”的学

风。他们在大力弘扬原始儒学关心国计民生和积极干预政治的基本精神的同时,特别注重开掘孟子思想的积极因素,进一步提升孟子在儒家代表人物中的地位,并在对释、道的猛烈批判中使儒学的理性原则得以高扬。1126年北宋灭亡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确立了在山东的统治。一方面,大量山东儒生南迁,对南宋理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一方面,留居原地的儒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儒学的传授和播扬,并通过从政对金朝的政策施加影响,使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汉人的苛政。1234年蒙古灭金后,山东先是在蒙古帝国,后来在元朝统治下度过了130多年的艰苦岁月。这一时期,山东思想文化上的最突出的成就是泰安长清(今山东长清)人严实创立的东平府学和由此形成的东平学派。这个学派的数以十计的学者一边通过讲学活动传播儒学和培养人才,一边通过进入各级官府贯彻自己的从政理念,在元朝建立后50多年间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和思想。

明清时期(1368—1911年),中国已经步入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一方面,两朝,尤其是清朝,中国的疆域大大扩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几度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显著成长,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居于世界首位。另一方面,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已经发挥到极致。整个封建社会面临着不可挽回的没落局面,而当时成长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还不足以突破封建的经济结构,中国还不具备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条件。与此同时,欧洲的先进国家却日益加快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民族灾难就不可避免了。明朝(1368—1644年)统治者一直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明朝中期以后,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创立的“阳明心学”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流风所及,以穆孔晖、王道、张后觉、孟秋为代表的山东学者与之呼应,形成了“山左王学”,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占有一定的地位。另外,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结他在战争实践中的经验,创立了颇具特色的军事思想。清朝统治时期(1644—1911年),尽管程朱理学依然是官方推崇的统治思想,但由于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剧变对知识分子的刺激,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开始对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批判,由此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实学”思潮。山东学者张尔岐的经学研究、马驥的史学研究,就是对这一思潮的思想和学术上的回应。清朝中期,兴起了以对中国古典文献整理、考证、辨伪、辑佚为主要

内容的“乾嘉之学”。山东学者对此也作了强有力的回应,桂馥、孔广森、郝懿行、牟庭、王筠等在经、史、文字、音韵、金石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不过,应当承认,在明清时期,山东已经不是中国思想学术的中心,也没有产生在思想和学术上居于全国前列的领军人物。

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大都将 1840 年爆发的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方面,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成长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也逐步走向高潮。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并在对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的不断批判中创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山东是较早遭受外国侵略的地区,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得比较激烈的地区。在 1900 年前后的义和团运动和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中,山东一度成为反对外国侵略的前哨阵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山东又成为最激烈的主战场之一。山东人民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山东既不像东南沿海的广州和上海那样得风气之先,又不如北京那样的政治中心集中了大批知识分子精英,因而在思想文化的创造方面尽管产生了傅斯年这样顶尖的学者,但却未能产生对全国有影响的思想学术群体,也没有产生影响深远的思想学术成果,基本上停留在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回应的层面上。